

中国古代文献学

ZHONGGUO GUDAI WENXIANXUE

万 刚 主编



中国古代文献学

主 编 万 刚

副主编 李红浪

李 星

费育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简 介

中国古代文献学是近七八年来高等院校文科类学生所开设的一门专业课,本教材共分八章,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文献学方面的知识要点,诸如文献的源流、特征,文献的积聚与散失、古籍制度、分类、校勘、收藏等。作者在编写过程中,既注意了文献学基础理论的阐述,又注意基础知识的介绍。同时,又尽量突出其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因此,本教材既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科类学生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作为喜好古代文献学的自学者的自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献学/万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301-12983-8

I. 中… II. 万… III. 古文献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2103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献学

著作责任者: 万 刚 主编

责任编辑: 吴坤娟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983-8/H · 1889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3 出版部 62754962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xxj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0.5 印张 227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中国古代文献学》这门课，从我校中文系 98 级开始开设，至今已有近 10 个年头。10 年来都是由我主讲，据学生反映，学完这门课程后，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知识。我国古今学者都很重视目录、版本及校勘等知识对读书的指导作用，视之为“门径”。清代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近人余嘉锡先生说：

“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他们都从自身治学的经验，认识到文献学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它不但告诉读者古籍制度和版式行款等知识，而且还给读者指示出：如何选书来读，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该精读、什么书该泛读，一书有几家注释，何家注释为优、何家为劣，应汲取什么、摒弃什么，什么版本为优、什么版本为劣，作家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历史上对该人该书的评价如何，等等。弄清这些方面的问题，就会通晓某一学术流派的渊源，以及某一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省去许多探讨之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鉴于目前古代文献学这类书籍较少，学生上课没有合适的教材，笔者参照了国内一些大学有关文献学的资料，并结合学生的实际，在内容方面不断改进和逐渐丰富，编写了这本书稿，目的是从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实际水平出发，大小由之，使每个人各有所得，但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限，其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殷切希望得到各方面专家的指正帮助，笔者将在今后的教学中努力补充提高，使之更臻完善。

参与本书编写、校勘的还有李红浪、李星、费育曼、何玉霞、陈显军老师，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吴坤娟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作了非常悉心的校勘和指导，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的出版获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材出版基金资助。

万 刚
2007 年 2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文献的定义.....	1
二、文献的特征.....	2
三、偏重中国古代典籍.....	2
四、学习文献知识是为了读古书.....	3
五、民族文献的种类.....	3
第二章 文献积聚与散失.....	8
一、历代文献积聚概况.....	8
二、现存古典文献数量.....	9
三、文献散失.....	10
第三章 我国古籍制度.....	13
一、书籍的兴起.....	13
二、简策制度.....	16
三、卷轴制度.....	20
四、册页制度.....	23
第四章 古籍的分类.....	26
一、目录的产生.....	27
二、我国目录学发展的概况.....	28
三、系统目录的建成.....	31
四、史志目录的创立.....	34
五、中古时期四分法目录的建立.....	44
六、清代官修目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52
七、私家藏书目录.....	67
八、小说目录.....	87
九、丛书目录.....	92
十、类书目录.....	96
十一、常见目录一览表.....	102
十二、目录读书.....	104

第五章 古籍的版本	107
一、版本与目录的关系	107
二、古书版本发展概况	108
三、几种书本名称	116
四、版本款识	117
五、怎样鉴别版本	118
六、版本鉴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122
七、记载的版本的书目	123
第六章 古书的校勘	125
一、什么是校勘	125
二、古书为什么必须校勘	126
三、校书的依据	128
四、怎样进行校书	130
第七章 古典文献的收藏与阅读	132
一、历朝古典文献的收藏和官、私藏书	132
二、古典文献的典藏	139
三、古典文献的阅读	143
第八章 主要诗文集版本举要	151
一、《诗经》	151
二、《孟子》	152
三、《墨子》	153
四、《曹子建集》	153
五、《史记》	154
六、《陶渊明集》	155
七、《谢康乐集》	156
八、《谢宣城集》	157
九、《乐府诗集》	157
十、《遗山先生文集》	158
十一、《关汉卿戏曲集》	159

第一章 绪 论

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献学》这门课，可以扩大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我国古今学者都很重视文献、重视目录、版本及校勘等知识对读书的指导作用，视之为“门径”。清代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近代余嘉锡先生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之学，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他们都从自身的治学经验，认识到有关文献学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它不但告诉读者以书籍制度和版式行款等知识，而且还给读者提示出：如何选书来读，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该精读、什么书该泛读，一书有几家注释，何家注释为优、何家为劣，应汲取什么、摒弃什么，什么版本为优、什么版本为劣，某一版本出版者为谁、出版地何处、收集在什么丛书中、如何找到这本书，作者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历史上对该人该书的评价如何等。弄清这些问题就会通晓某一学术流派的渊源，以及某一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省去许多探讨之劳，步其捷径，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化古籍。历代文史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费了不少力气来整理这些古籍，编辑提要、分目归类，推阐大义，使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知识趋于系统化。余嘉锡说：“目录即学术史也。”郭沫若说：“历代史书多有文志，虽仅其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的一斑。”可见古今学者都把文献学看成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基石，文献知识的重要意义也在此。

一、文献的定义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内容丰富的历史。早在四千年前的夏代社会就已跨进了文明的历史，两千年前的中国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夏朝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殷朝的礼仪，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他们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若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孔子在这里提的“文献”作何解释呢？魏时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解释说：“文，国君文章；献，贤才。”宋代朱熹解释说：“文，典籍；献，贤也。”他二人的解释相近，说的都是国家

的文物典籍和国君的才干表现。意思说杞宋两国虽然都是夏殷两朝的后代，但是两国衰落了，他们的文物典籍和国君的才干，都不足以为夏殷时礼仪的证明，孔子所说的“文献”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献的意义，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是文字和文物的意思；“献”有“进”的意思，进即是贡献，所以说：文献，即是以文字记载的东西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而已。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言里说：“所谓文，就是把当时臣僚的奏疏和言论记载，摘取了来，献呢？是把自己研究的心得记载下来，这样的书籍便是文献。”“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一是书本记载，一是人们口传议论）他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写成《文献通考》一书的，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说，凡是文字记载的史实书籍就是文献。

后来，“文献”的概念有了变化，单指历史文件而言。而现在的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含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记载，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自我国于1873年在汉口创刊《昭文日报》开始近代铅字印刷，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于古典文献的范畴之内，古典文献包括文学文献、史学文献、哲学宗教文献、政法文献、方志文献、科技文献，以及其他特种文献。

我们弄清楚文献的概念，进而便会理解文献的概念。凡是以文字记载的史实书籍就是文献，那么研究这种书籍的学问就是文献学了。

二、文献的特征

文献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记录，它具备两个特征。

1. 外部特征：题目、作者、篇幅等；
2. 内容特征：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等。

题目、作者等基本上是属于目录学的范畴，而就书籍的主要内容加以介绍、提示和评论等，也是目录学所担负的任务，篇幅长短、刻工、印刷上的精粗美恶，内容上字句上的确切与否，又属于版本和校勘上的问题。由此可见，文献学，既包括书籍制度，又包括目录、版本、校勘等，而目录、版本、校勘又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但它们之中又以目录为核心。

三、偏重中国古代典籍

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化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它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全部史实和经验,并为后世获得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提供了条件。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人类精神的宝库,是中华民族祖先文明发展史的物质见证。

中国古典文献,号称汗牛充栋,它的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绚丽多彩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典文献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以及宗教经典,等等。

文献学的范畴如此广泛,是否要把所有的书籍,不分文理,不分古今都加以介绍呢?并且都加以分类、排比,提要和考校呢?当然不是的,事实上也不会有那么庞杂的文献学。我们谈文献学只是就某一专业的文献谈谈而已。我国古代学者在治理文献学上,也多偏重在古代典籍方面。孔子编订六经可以说是最早的文献工作。《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诗据说有三千余篇,孔子删订为 305 篇。所以我们今天所探讨、重视的主要是古代文献学。

四、学习文献知识是为了读古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由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到经史子集;从佛经道藏到金石碑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丰富得很,今天现存的古籍究竟有多少,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精确的答复,大略的估计,在十万种左右。古籍这个名词显然是指书籍著作的时代划期而言,但怎样的划法,也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一般的说法是断自辛亥革命为止,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辛亥以后的著作,凡是与古籍有关的,也应以古籍来对待。

历史年代这样漫长久远,著作相当丰富。就以春秋战国时的书籍来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便不要说了,没有见到的如《墨子》一书所引的周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又说:“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宝书。”可见我们未曾到的书还是相当多的。

五、民族文献的种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献,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添了重要内容。中国古典文献除了汉文文献外,还有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焉耆-龟兹文、八思巴文、彝文、纳西文、老傣文、蒙古文西夏文、女真文、满文等,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以下介绍几种主要的民族文献。

1. 藏文文献

藏文属于古老拼音文学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七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字体创造的。此后用之记载有关藏族的历史文献,包括经卷、文学、史传、天文历算、藏医以及因名学等。公元九世纪的古藏历史文献,已于敦煌石室发现,

约五千余卷。原件于1908年被动运海外,分藏于英、法等国。文献记述主要内容:①吐蕃大事纪年:起公元641年,终764年。逐年记事,举凡会盟、征战、猎狩、封赐、继立、婚姻、通聘、赋敛等大事。②吐蕃赞普传记长编及大论位序表。多为古老传说,轶闻掌故,弥足珍贵。

藏文文献多属写本,我见到最早的藏文刻本是明永乐九年(1411年)年刻本,文献价值极高。传世藏文文献数量很多,目录尚难作出确切统计。明代成书的札贡巴·丹巴若杰的《安都政教记》中,即列举英雄格萨尔的事迹贯穿,构成一部完整宏伟的文学作品;史传提供了有关古代藏族社会、历史、语言、民俗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是研究古代藏族的重要参考文献。

据了解,目录西藏地区保存有大量藏文文献,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就有三百万件之多,还有堆放在布达拉宫28间房子里的两万多部经书。这些浩如烟海的藏文资料,是研究西藏历史、宗教、科学和文化的大宝库。从一部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看,其中有反映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文献;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西藏三大领主叛国投敌,分裂祖国的罪行记录;有西藏人民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史料,还有对研究喇嘛教育珍贵价值的大藏经和手抄贝叶经等图书,以及新近发现的西藏历史上的地震资料30多条。这些文献大都是古藏文,译释整理难度较大,有的从未整理。1978年以来,已成立自治区历史文献资料整理领导小组,抽调和聘请懂得古藏文的人员参加这项工作,争取早日把积存的各种藏文资料整理出来。

2. 焉耆-龟兹文献

旧称“吐火罗文”,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蕃等地,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用的是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斜体,所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Centum语组。有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使用于焉耆-高昌(今吐鲁蕃)一带,乙方言则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因此,过去又有人分别称为“甲种吐火罗语”、“乙种吐火罗语”。

已发现的焉耆-龟兹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宗教文献以佛教文献为主,目前已刊布或已编目者有《法句经》、《佛所行赞》、《一百五十赞颂》、《福力太子因缘经》等。文献作品内容也很广泛,有剧本、诗歌、故事等。《弥勒会见记剧本》长达二十七幕,用焉耆文写成,每章前都标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后来被译成了回鹘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古代剧本。此外,还有字书、公文、帐册、医术、占卜、历史语言等,对研究新疆地区历史颇多参考价值。

焉耆-龟兹文献,绝大部分被各国探险考古人员运往国外,分藏于柏林、巴黎、圣彼得堡、伦敦、新德里、东京等地。早在1921年德国刊布了《吐火罗语残卷A》两卷本,1952年根据托马斯遗稿整理出版了《吐火罗语残卷B》,是研究甲乙方言的宝贵原始资料。我国学者冯承钧的《吐火罗语考》、季羨林的《吐火罗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焉耆-龟兹文献研究贡献很大。

3. 回鹘文献

新疆维吾尔族，在历史上称为回统或回鹘。他们创制的回鹘文渊源于粟特文，是古代维族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以前使用最广的一种文字。它在历史上曾为不同信仰的维族所用，也用于一般世俗文献，如信札、契据等，元代用于木刻书中，一直使用到14、15世纪。而在甘肃酒泉附近发现的木刻回鹘文《金刚明经》则刻于17世纪（康熙26年）。除回鹘文外，维族自公元7到15世纪还用突厥文、摩民文、婆罗米文以及粟特文、藏文、叙利亚文等不同古文字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有关社会历史、经济、文学、医学、天文学、语言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从公元10世纪下半期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出于宗教偏见，各种属于非伊斯兰教的古代新疆维族文献，虽遭致大规模经营的毁坏，所以现存的维族各种文献已为数不多了。

维族各种古文字文献，大体有历史文献，如《雀林碑》、《阙特勤碑》等铭文；有各种文契，如买卖奴隶、土地、借贷与遗产分配等；文学作品有民歌、挽歌、赞美歌、宗教诗歌等；宗教文献有佛教经典、摩民教教义、忏悔词等；此外还有字书、历法、医学、占卜、文书、信札等。文献数量虽不多，但对研究维族历史文化都十分重要。

4. 西夏文献

据《辽史》记载，西夏赵德明时“制蕃书十二卷，又制文字……”。重熙五年（1036年）赵元昊继承父位，命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其规模化“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作为国书，“教国人纪中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官杂学》为蕃语”，流布大量经卷文书。至正五年（1345年）元朝建造的居庸关六体文碑中有西夏文，长期无人辨认研究。1895年法国人德利亚地肯定之为“西夏国书”。1908年俄国人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族黑水城址盗掘一座古墓，劫走数以千计的各种文物资料，其中有《文海》、《音同》等，俄国人开始以此研究西夏文献。我国学者在研究西夏文献方面也汲取了不少成绩，1919年罗福成研究出版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书籍》。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西夏文献研究专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载有《西夏文专员》。

西夏文字形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虽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二百余年。当时西夏与各王朝、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用此文字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及著作，曾广为流传，还用西夏文译释了汉、藏、回鹘文大量典籍和佛经。西夏文献国内收藏，除大量佛经外，有珍贵的文书资料，如《瓜州审判记录》。此外，还有大量的碑文、石刻、题记以及印、牌、钱币等。英国、日本、苏联收藏的西夏文献也相当可观。柯兹洛夫在黑城所获的一批西夏文献，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963年，苏联出版了这批文献的考定书目《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录文献405种，其中佛经占345种，世俗著作60种，这批世俗文献的主要内容十分广泛。

5. 契丹文献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创造有契丹文字，据《收史全要》记载：“辽太祖（872—926

年)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契丹文字分大、小两种,大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年)在突吕不和鲁不古等人的赞助下创制;小字为太祖弟耶律迭剌所造,据说是受回鹘文的影响,在改进大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比大字“数少而该贯”,称“小简字”,约成于公元925年前后。两种文字并用于辽、金时代,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下令停用,其后渐变,在东北地区行使二百七十余年。据《辽史》记载,曾用契丹字翻译了不少汉文书籍,但这些书籍皆已失传。

已发现的契丹文献资料,主要有墓志、摩崖与洞穴墨书以及镜、钱、印章等。举其要者有辽太祖祖陵残碑,辽兴宗及仁懿皇后四哀册,故太师铭石记等。

6. 蒙文文献

蒙古文字是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据1979年《全国蒙文新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在国内六十家图书馆中,收藏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或抄写的蒙文图书资料约一千五百余种,总计七千余册。内容包括哲学、宗教迷信、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语文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医学、金石拓片以及期刊等十五类,材料十分丰富,为研究蒙族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是13世纪20年代的石碑铭文。在蒙古文献中,《蒙古秘史》值得特别介绍。此书成书于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用畏吾儿字母写成的《蒙古秘史》。撰者不明,已佚。本书主要内容记载成吉思汗至窝阔台汗时代社会历史情况,起于成吉思汗22代前的远祖孛儿贴赤那,止于窝阔台汗十二年,前后约计五百余年。一方面阐述了蒙古社会民族结构及其生活情况;另一方面对蒙古国家制度形成作了生动描绘,成为一部珍贵史书。同时,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编修《华夷译语》时,为解决语言隔阂问题,曾经组织人力译释“秘史”,有蒙文的汉字音读,旁注汉文训释,别具特点。

永乐年间(1403—1424年)收藏于《永乐大典》,名为《元朝秘史》,作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二节。此后本书逐渐流传于世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在收藏蒙文文献集中的蒙古历史研究中,有一部《阿剌坦汗传》,是传世仅有的抄写孤本,极为珍贵,对研究蒙古族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我国对现存蒙文文献已开始进行系统整理,据报道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丛书《蒙古文献丛书》已开始编辑。这套丛书是8省区蒙古语文领导小组委托内蒙师范学院负责编辑的。“丛书”将包括自古代至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凡用蒙古语言写作的有关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历史文献著作,都进行搜集,校勘、编辑出版。这对保护蒙古族的文化遗产,开展有关蒙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促进蒙古族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7. 女真文献

女真文字是金代女真人参照汉文字创制的一种民族古文字,分大、小字两种。

女真文字颁行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创新字为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年)颁行。

金朝灭亡后,女真字在东北地区还有少数人使用,明中时渐废,行使四百余年。

现今流传下来的女真文献就只有一种,即明代所编《华夷译语》中所收的《女真来文》、《女真馆杂字》与一些石刻,如金大定25年(1185年)的“大金得胜陀颂”和永乐11年(1143年)黑龙江特林地方的“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碑等。

8. 满文文献

满族文字是明万历27年(1599年)额尔德尼、噶盖奉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命在蒙古文字字母基础上创造的。

清太祖天聪6年(1632年)达海改进这种文字之前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用此文字撰写的文献典籍,通行仅30余年,绝少流传于世,现仅存《满文老档》等早期珍贵文献。

《满文老档》载事起于太祖起兵,止于太宗崇德元年(1607年),用明代早旧公文纸和高丽笺书写,老满文、新满文兼而有之。“老档原本”三十七册。“草本”依原本整理,成于乾隆六年(1741年)。“正本”26套180年,成于乾隆四十牌(1755年)。

“老档”文献价值极高,是研究满族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最早的汉译本是金梁译本,共168条,5万余字,仅仅原文二十分之一。译释质量较差,错误不少。

达海改进后的新满文,在字母旁增加点或圈,又增加一些拼写汉语语音的新字母新形式,因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自此,满文形体始定,通行二百余年,再无改变。清代定满语为国语,故满文又称清文。

清代前期,与外国行文或重要文书,均用满文,为代表国家的文书。咸、同以后,满文应用已不如前,直至晚清,虽然满族已大部分采用汉文,但满文作为官方正式文字之一,仍在使用。清朝灭亡后,才逐渐废弃。

清朝曾用满文书写大量公文,编写历史,并译释许多汉文典籍,也用满文进行了有关哲学、历史、语言、文艺等方面的创作。因此,清代文献,保存于满文图书档案中者为数很多。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将当时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两家的满文藏书合为一目,收藏满文图书达419种。197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作,将北京地区十三个单位的满文藏书合编一部《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收录满文图书文献841种,这些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成为民族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文献积聚与散失

一、历代文献积聚概况

浩如烟海的汉族古典文献，在历史上有个形成与积聚的过程。

1. 汉哀帝时，公元前5年，刘向父子把天禄阁、石渠阁等汉朝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共得书13269卷。这是最早见到的我国古典文献的积聚数字，大致反映了当时政府收藏典籍的一般情况。

2. 西晋时期（265—316年）：秘书监荀勖对秘阁藏书做了一次整理，共得书29945卷。这个数字，比西汉时图书国家藏书增加一半以上。可是，由于战乱原因，渡江以后东晋李充再次整理国家藏书时只剩3014卷，当时典籍损失十分严重。

3.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受命编辑国家四部藏书，计得64582卷。梁元帝时（553—555年）江陵国家藏书已达七万卷。北朝社会长期动乱，“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字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魏书·儒林传序》），前秦苻坚虽广修学宫，博召学士，而典籍终不得聚。

魏道武帝建国，接受儒者建议，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而经籍稍集，到北齐、北周时有所增加。

583年，隋代周，牛弘上书曰：“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只有其半。”

隋朝统一中国后，十分重视收集图书，“每书一卷，赏缣一匹，校写既定，本还其主”（《隋书·牛弘传》），《隋书·经籍志》收录梁、齐、陈、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14466种，89666卷。

4. 唐朝建立，国家日益富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已超过前代社会发展水平。开元时期是典籍积聚的繁盛时期。开元9年（721年），元行冲奏上殷践猷等所修《群书四部录》200卷，名《古今书录》，共收书3060部，51852卷。

5. 宋代雕版印刷发达，典籍文献与日俱增广为流传。藏书共为6705部，73877卷，可称为宋代国家藏书的黄金时代。

6. 明、清两代，典籍门类庞杂，内容广博丰富，数量空前未有，实难作出确切统计。一部《永乐大典》即收书达22000多卷，七八千种，而《四库全书》收书3461部，79309卷。此外，“存目”尚有6793部，93551卷。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国家掌握的典籍文献共计10254部，172860卷。

二、现存古典文献数量

上述情况，只是典籍积聚数量的历史概述。而今所存古典文献的数量，尚难作出肯定确切的回答。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七八万种，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八万种。其主要根据：

第一，收入古籍丛书的单种文献，据 1959 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计有 38891 种；

第二，未收入古籍丛书中的单行刻本文献，据孙殿起编《贩书偶记》与《续编》统计，清人著述约 16000 余种。清以前遗存的单刻本文献没有统计资料，估计至少有一万种。二者相加约为 26000 种左右。

第三，在朱士嘉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基础上，1978 年 9 月普查全国 180 多个图书馆收藏的方志文献菜肴有 8500 多种。

以上三个数字约为 75000 种，但有重复。除此以外，尚有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以及谱牒，金石拓本等，可补其重复而有余。因此，目前我国古典文献约为八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

上述文献包括的门类很多，目前难以分门别类做出确切统计，仅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1. 有关地方志的文献

约有万种左右，其中包括省志、府志、册志、厅志、县志、卫志、所志、关志、镇志以及岛屿志等。旁及山志、水志、湖志、塘志、园志、楼志、亭志、寺庙志、书院志以及名胜古迹志等，虽不纯属方志，但也与方志有关。

地方志文献蕴藏着历史上的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系统资料，至今保存最早的文献。

方志文献的基本结构是以地方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既包括各行政区域的天文、气候、地形、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以及动物、植物、水族等的生长、迁移、灭绝的过程，还包括有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某些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

方志大多根据当时、当地的档案、卷册、谱牒、传志、碑碣、金石、笔记、信札之类原始材料编纂。因此，保存了丰富的自然与社会史料。有关地理方面，载有山川古迹、疆域、面积、沿革建置等材料；历史方面则有职官、兵务、大事记等材料；社会生活方面包括土地、赋役、关税、户口、物产、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民俗、语言、农民战争等材料。

中国方志历史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民族史和科技发展史等是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

全国各地主要图书馆均收藏有大量方志文献，北京图书馆约六千部，上海图书馆约五千部，南京图书馆约四千部。另外，日本、朝鲜、新加坡、美国、法国以及德国、意大利等均收藏有数量可观的中国方志文献。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购置中国方志一千五六百部

之多。

2. 有关农书文献

历代农书名著甚多,相当丰富,如汉代的《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唐朝的《四时纂要》,宋朝的《农书》,元朝的《农桑辑要》,明朝的《便民图纂》、《农政全书》以及清朝的《授时通考》等。历来受到目录学家的重视,许多书志中均列有“农家”专项收录有关农书著述。

解放后,1957年王毓瑚先生编《中国农学书录》,对所收420余种古农书作了提要介绍。1959年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古农书联合书目》,收全国25家图书馆藏农书626种,包括水利工程、农政、田制、屯垦、仓储、赈灾、纺织、熬盐、酿酒、刺绣、园林、瓶插、饮膳、烹茶、名物注释、植物学、地方物产、掌故杂记等门类较为杂乱,主题不集中。

现存古农书数量庞大,虽经部分整理,但不能作出确切统计,根据20世纪20年代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记载,估计约有二千种左右。

3. 有关医典文献

种类与数量也相当可观。

中国古代医药遗产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耀眼夺目。长期形成的大量医典文献中,蕴藏着我们祖先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的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它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医籍考》记载,自秦汉至道光年间,两千年来,大约有三千数百种医典文献。

1961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图书馆主持,根据全国59个图书馆的收藏编成的《中医图书联合书目》统计,我国现存有关医典型文献共有7661种,再加上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医中药研究成果的文献,总数约有万种以上。

三、文献散失

(一) 典籍屡遭厄运

由于种种原因,在文献积聚过程中,遭到了多次严重损毁,散失亡残难以计算。

《古今伪书考》作者姚际恒,在清代可称之为“博究群书,撑肠万卷”的著名学者。据《国朝杭郡诗辑》记载,姚氏著有《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而今日见到的仅有《诗经通论》及残本《春秋通论》而已。清人著述散失尚且如此,可见前代亡书更不在少数。

(二) 有关文献亡失情况

1. 前人论述者,当推隋朝的牛弘,他提出书有“五厄”。

(1) 秦始皇三十四年(213)焚书;

(2) 汉末王莽之乱,宫室图书并从焚毁;

(3) 东汉末年,献帝移都,董卓之乱,典籍荡然无存;

(4) 西晋秘阁藏书 2900 余卷, 尽毁于“八王之乱”(291—306 年)

(5) 南北朝时期永嘉乱后(307 年), 北方长期动乱, 一毁于“侯景之乱”, 再毁于周师入郢, 七万卷典籍毁于一旦!

2. 明朝胡元瑞接牛弘之说, 补论“十厄”:

(6) 隋朝藏书盛于一皇, 不久毁于杨广之手;

(7) 唐朝藏书盛于开元, 不久毁于“安史之乱”(755) 年;

(8) 唐后朝, 肃、代二宗荐加纠集, 唐末战乱, 复致荡然;

(9) 宋朝图书, 一盛于庆历(1041—1048 年), 再盛于宣和(1119—1125 年), 而遭女真“靖康之灾”(1126 年)

(10) 南宋图书, 一盛于淳熙(1174—1189 年)再盛于嘉定(1228—1224 年), 而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1228 年)

明清以后, 古典文献的散失也很惊人, 国家藏书不论, 私人藏书更为幸免。在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中, 吴伟业收藏金、元以来的大量书籍焚于一旦。为此, 作诗以记其事:

“金元图籍到如今, 半自宣和出禁林。

封记中山玉印在, 一般烽火竟销沉”。

清朝中叶, 在收编《四库全书》过程中, 进行全国大清查, 人为销禁典籍, 胜于前代。据统计: 1774—1788 年间, 清朝下令禁毁书籍 24 次之多, 共计禁毁书籍达 13862 部。

孙殿起讲: “据禁书总目, 掌故丛编诸书考之, 在于销毁之例者, 将近三千余种, 六、七万部以上, 种类数量几与四库收书相埒。”“每叹我国古籍, 自秦政焚书后, 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

清代典籍的禁毁内容十分广泛, 凡属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作品, 诸如钱谦益、屈大均、吕留良等人作品均在禁毁之例。许多典籍中有所谓“悖亡”、“轻浮”、“明季恶习”者, 也予禁毁。

15 世纪初, 辽事兴起后, 凡记载女真叛乱者, 涉及“防胡”、“虏者”、“北虏”内容 5 的赵良佑、马文升等人的作品均列入禁忌范围。

16 世纪以来, 辽事紧张, 诸如高拱的《边略》一类作品, 谈及女真犯边事者, 一律列为禁书。

17 世纪以来, 宋一韩的“掖垣封事”、刘若愚的《酌中记》, 均谈及东北守备, 直涉及女真扩边犯境问题。冯琦的《四夷考》, 于慎行的《谷山笔尘》、《读史漫录》等, 涉及汉唐以来东北疆域沿革, 有碍满洲入主中原内容的典籍, 亦不放过。

鸦片战争以后, 战乱频仍, 典籍多次损毁。太平天国军队开入扬州、镇江等地, 毁掉不少典籍,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永乐大典》荡然无存。

(三) 典籍散失原因

综上所述, 中国古典文献历次多次散失, 情况十分严重, 究其主要原因有如下方面。

第一, 统治阶级的暴力禁毁是典籍文献损毁的一个重要原因。